

论具体乌托邦精神视域下的文艺创作路径

傅其林 马云鹤

〔摘要〕 具体乌托邦理论是由20世纪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恩斯特·布洛赫提出来的。他将虚无的乌托邦具体化为可以经由充满希望驱动的人类实践活动通达的美好境地。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演绎了在具体乌托邦精神旨意导引下对文艺创作路径的积极思考，而她这份被嵌入20世纪南斯拉夫具体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被置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视域中的文艺创作路径探讨，必然会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例证更能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带来启发。

〔关键词〕 恩斯特·布洛赫；唯物辩证法；具体乌托邦；扎戈卡·哥鲁波维奇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5)04-0200-09

徐崇温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序言》中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①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战后欧洲诸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中不乏片面的理解。以两种主流的思想样态为例，一种是以斯大林极权主义为精神引领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它高度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实践活动产生的限制性，并将这种限制设为强制不可破除的。这种阐释方法会逐渐剥离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将人变成对客观现实再无积极应答的机械原子，犹如波格·丹诺夫笔下那些充满负电荷的电子云。另一种是西方某些片面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抛弃个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不谈，一味强调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社会必要性的阐释方法又会因为对所有现存外部环境限制的漠视，从源头上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置换成惰性，从而将人类引导到毫无敬畏之心的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涡流中，使人类形成另一种对社会进程毫不关心的冷漠应答。因此，无论是第一种将外部限制看作无法破除的阐释方法，还是第二种将内在主观能动性看作无所不能的阐释方法，都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如何通过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最大程度地在人道主义实践活动中发挥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作者简介〕 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马云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22JZD005）

① 徐崇温：《序言：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李菱、邓玉庄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

性。马克思说过,“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①

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提出的具体乌托邦理论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既区别于以上提到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区别于片面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示范了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有效运用马克思方法论解决具体问题。

一、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精神

“具体乌托邦”(Konkrete Utopie)是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回应了战争、技术管制带来的人和社会的异化、旁观者思维驱动下的社会构建参与度不足、拜物教、教条工具、虚无主义、道德水平下滑等各种危机。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既是布洛赫对马克思的乌托邦范畴的恢复和凸显,也是他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哲学改变20世纪社会现实的实践尝试。布洛赫说,“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②在1976年与J.-M. 帕尔米尔的谈话中,布洛赫也明确指出,“乌托邦范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之中,我只是把它取了出来而已。”^③

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将“希望”与“体系”对立的观点不同,布洛赫在其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中强调了“希望”在良好社会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希望哲学“将成为明天的良心,代表未来的党性,拥有未来的知识。”^④他认为,世界和历史都是动态发展的,此时此刻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终结,“相反,否定意味着真理。人和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持续发展的可能存在,即趋势-潜势之中的实验性的存在。”^⑤而在这种将否定经由趋势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人作为一种主体对“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和“尚未形成的东西”的清醒认知和强烈希冀将作为一股具有明确矢量的驱动力内化于人的实际行动中,使人类可以依循关于未来清晰的预先推定抵达梦想的家园。所以布洛赫对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乌托邦旨意的重点渲染,既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也不是一种对白日梦的空想,而是一种立足于美好未来审视当下并为现实提供修正意见的勇敢实践。他说,“对尚未形成的可能性的期待、希望和意象而言,这不仅是人的意识的基本规定,也是在客观现实之内被具体地校正和把握的总体的基本规定。”^⑥

布洛赫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战后欧洲人们普遍低迷信心的提振,也是对人们狂热迷信技术理性弥赛亚的纠偏。他主张依托具体乌托邦旨意的传达爆破现实。布洛赫写道:“在哲学领域里,迄今‘未来’并未得到十分恰当的注意。这导致一种可称之为占主导地位的静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理解这一未来特性,而且在业已形成的东西中一再结束未来。”^⑦布洛赫主张对美好乌托邦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描绘,并通过发挥乌托邦精神的积极效力激发个体思想和行动中的潜能,从而通过人的主动实践抵达家乡或自由王国。而架构起布洛赫具体乌托邦实现信心的关键力量来自马克思的“理论-实践-中介”概念。布洛赫在提及其《乌托邦的精神》创作心得时提道,“因此,对其完整的实践概念及其潜藏的意志决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中介’(Theorie-Praxis-Vermittlung)概念是必不可少的。”^⑧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

② 梦海:《序言: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③ E. 布洛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与J.-M. 帕尔米尔的谈话》,梦海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第20页。

④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前言,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⑤ 梦海:《序言: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第11页。

⑥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前言,梦海译,第7页。

⑦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前言,梦海译,第5—6页。

⑧ Ernst Bloch, *Geist der Utopie* (1974) in Arno Minster (Hrsg.) *Tagtrume vom Aufrechten Gang Sechs Interviews mit Ernst Bloch*, Berlin: Suhrkamp Verlag, 1977, SS. 162–171. 转引自金寿铁:《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解读——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创新意识》,邓晓芒、舒红跃主编:《德国哲学》2020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93页。

首先，从理论层面讲，具体乌托邦概念是布洛赫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20世纪人类困境的思想产物。具体乌托邦概念的提出是他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深入探究的结果。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应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中的行为，扬弃了哲学界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观照下的辩证唯心主义思考范式以及其他片面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使得这些“辩证的物质既不像黑格尔的回忆-精神，也不像自德谟克利特（Demokrit）以来的机械物质那样，在过去的视野中拥有自己的总体，而是在未来的视野中拥有自己的总体。”^①而这种对时间总体性视野的获得涤除了盲目性、偶然性、消极性、必然性客观现实加诸在人类身上的管制，重塑了人类的主客体关系，为人类的主体性的获得提供了重要机会。“在由人类创造的这个世界中，辩证法本身是主体-客体关系，而不会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是努力获得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断重复地超出，并努力突破为它而形成的客体化和客体性。”^②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帮助人类获得主体性的方法论，它既强调唯物，接纳现实的限制性；也强调辩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破除限制。而这中间的衔接中介就是希望。布洛赫说马克思总能在不幸中看到转折，而也正是对希望的强调使得马克思“能够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区别开来”。^③在对“尚未”怀抱希望的驱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不是作为某种静态的东西……而是作为乌托邦的总体，确切些说，是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的总体，作为一个仍然未完成的世界的过程的潜在性而出现的”^④，而这种面向潜在性爆破以及纠偏现实的能力和勇气，未尝不是一种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它用希望遏制了消极，也用唯物拦截了虚妄的空想，锚定了乌托邦的具体所在。布洛赫将自己的乌托邦概念定义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准确说来，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概念是一种强调了希望成分的唯物辩证法演示。

其次，从实践角度来分析，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是在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引导下的人道主义实践，它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进程的介入和影响。布洛赫说，“马克思主义第一个把知识概念带到一个本质上不再指向已生成物，而是指向正在到来的趋势的世界；于是，它第一次把未来带入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把握。”^⑤而这种面向潜在性视野的转换和经由潜在性视野获取内容对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介入，使得此刻的现实不再成为一种固定既成，而是变成了一种动态生成，就像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科西克的观点——真理的世界在实践中慢慢展开。^⑥这种生成关联着来自未来的美好旨意，而且这份美好旨意的存续既受人类强烈的主观意愿安置的保障，也受到人类勇敢的有规划实践的检验。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固然绕不开现在的具象事实，但是人类可以通过对未来的设问、追问、规划和实践来摆脱具象生产关系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修正现实中与主观规划的美好乌托邦不匹配的地方，从而使贫瘠的人变得丰盈，使通往美好乌托邦的道路更为顺畅。这种将人的总体视野的审视引入人的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做法，是一种对人的力量的高举。这在人的力量被物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管制普遍遮蔽的20世纪欧洲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理论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力量的托举。其《乌托邦的精神》更是以“我在，我们在”这句宣言作为全文开头，强调在美好未来趋近的序列中，人的力量显现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人的实践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力量，在它改变现实的同时，也反过来受被寄予希望的未来乌托邦精神的引导。所以在实践发起之前，对乌托邦蓝图细节的描述越详尽，它就越能发挥出强大的规划力量。当然这种对细节的填充需要在正视人民心中潜藏的真正基础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最高旨意，在正视这种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乌托邦美好愿景的发动能力进行意识改革，再作用于意识革新后的行为主体。因此，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理论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空想。它植根于人内心的希望，生发于人

① 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阐释》，舒远招、庄振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408页。

② 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阐释》，舒远招、庄振华译，第517页。

③ 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阐释》，舒远招、庄振华译，第408页。

④ 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24页。

⑤ 转引自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⑥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强调意识的预先推定功能,主张通过乌托邦精神的激励作用将鲜活的个体置于建构人类通过主观规划和客观境遇研判而绘制出的美好世界的进程之中,用以对抗社会的自动化过程。他既强调人的规划和希冀,也强调人的实践和参与,并鼓励人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趋势和潜能变成现实。

最后,从中介的角度考量,20世纪呈现于人类生活情境中的乌托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自由市场物的鼓动下营造出来的繁华绮丽的乌托邦,一类是在科技力量的澎湃下锻造出来的无所不能的理性乌托邦。在这两种虚假乌托邦的遮蔽之下,真正乌托邦携带的希望的力量已经被物的管制和技术逻辑拦截,它不再指向未来,而是耽于此刻的沉沦。因此从现实进入具体乌托邦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它需要经由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提到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中介过程。此过程既需要以对驻扎在眼前社会现实的感知为起点,也需要以希望力量对全景式总体视野的熔铸为驱动,还需要以乌托邦实现路径的清晰规划为保障,又需要以人的积极勇敢实践为手段,并且感知、希望、规划和实践的发动都不只面向过去、现在,还强调对未来的前瞻性和策动性。毕竟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语境里,乌托邦从来都不是一个置身于历史风暴之外的无虞之地,它关联生产也关注人的喜怒哀乐。并且,乌托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告诉人类,人类的生活环境虽然会无可选择地被那些作为规则象征的“定在的线”围绕,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希望的激励下冲破束缚,脱离“定在的线”做自由运动,就像马克思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描述的那样。而受益于马克思希望精神传承的布洛赫,主张利用外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调动人作为主体参与美好社会构建进程的热情。这个外部条件不仅指“形式的可能性”“事实的-客观的可能性”“类似事实的-客观相称的可能性”,还有容易为人所忽视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也就是未完成的隐德来希。^①尤其是那些未完成的隐德来希作为一种传送可能性旨意的重要中介,在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理论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综上,布洛赫对具体乌托邦的定义也许就藏在其《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阐释》一书开篇的设问中,“即使从虚无中也会生出某物。但是,必须同时有某物被置于虚无之中。这样看来,没有人可以给出他事先并不拥有的东西。至少要有获得某物的心愿,否则,那得来之物就不会作为礼物而被感受到。它必须是被追问的,哪怕只是在一种模糊的情感中。事先未被追问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答案生效。”^②具体的乌托邦首先是一种能够被强烈感知到的心愿,其次是一份勇敢面向虚无索问后才能生效的答案,在具体的乌托邦得以抵达的语境里,感知、许愿、追问、规划、实践缺一不可。

二、扎戈卡·哥鲁波维奇的实践演绎

具体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兼具理想与现实、希冀与行动、谋划与实现、源头方向策动和过程动力保障的实践方法论,曾经被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哲学研究中践行过。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视域下,一切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改变现实,且现实的改变不是用一种糟糕的现实替代另一种糟糕的现实,而应该是美好的现实替代糟糕的现实。那如果在行动的起点就设定好清晰的目标,并不断在过程中让实践的主体感受到由终点传递过来的美好旨意,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下,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概念体,东欧在兼容了战争、解体、重组、革命、自由、解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人道主义实践等多重标签之后,为具体乌托邦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环境。这份独特里包蕴着艰难,也在艰难中激活出一种真挚而强大的、奔赴美好乌托邦生活的勇气。在众多表征勇气的实践行为中,艺术一直因其与梦幻和希望的紧密联动而被寄予厚望,尤其是在人的声音被斯大林极权主义压制的时候。当艺术创作行为被置于强制管制的境遇,它该如何自由自洽地发挥出积极的乌托邦作用?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扎戈卡·哥鲁波维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践演绎。

(一) 教条主义管制下的艺术创作环境

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哥鲁波维奇是在什么样的现实环境里去讨论艺术的话题。南斯拉夫政权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官方叙述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

^① 隐德来希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语,是希腊语 ἐντελέχεια 或拉丁语 entelecheia 的音译,意为“完全实现”,指每一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不包含潜能的现实。现实是潜能实现的推动者,推动者分为切近的推动者和较远的推动者,其中有一个第一推动者,亚里士多德就称之为隐德来希。

^② 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阐释》,舒远招、庄振华译,第1页。

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事实上它的社会主义道路革命并没有因循着官方意识形态为它谋划的笔直而平静的路径一直前进，相反，它受到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因为融合或者分裂而产生的政治、文化、经济冲撞夹击，它在重组和解体中寻找出路。抛开其他阻力不谈，在斯大林极权主义管制下，南斯拉夫当时在艺术创作上面临的两大股牵制力量就是斯大林极权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享乐文化。极权主义是源头，享乐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必然补充。波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斯大林是以生产手段的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几乎是最充分的）极权主义。”^①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里，涉及文化的向度，哥鲁波维奇是这样定论的：“换言之，政治支配了文化的一切其他因素。结果，为了维护现存秩序的利益，文化活动便服从于‘引导’和控制。归根到底，文化是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和那些通过检查机构公开而专横地压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在南斯拉夫社会中，国家使用的是禁令——即统治阶层的组织在禁止任何与其愿望和旨趣不相吻合的事物时所使用的经典工具。……为了防止在报纸、杂志和电影中出现不合需要的资料，法院便出面用其权力予以禁止，并判决文化的价值”。^②可想而知，在斯大林极权主义管制下，南斯拉夫曾面临多么严苛的艺术创作环境。也正是在与这种压抑的艺术创作环境对抗的过程中，哥鲁波维奇探索出了经由艺术创作通达具体乌托邦的路径。就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言，“新社会无疑将印有孕育了它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纯洁无瑕’的出发点。”^③可以说，哥鲁波维奇文艺理论研究正是起步于这个既不纯洁无瑕，也不整齐规范的胎记。

（二）文艺理论语境中的“乌托邦”概念关乎人的自由和解放

对当时南斯拉夫国内被某些特权阶级严格管控的艺术创作环境的了解，是把握南斯拉夫实践派文艺理论乃至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文艺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因为南斯拉夫实践派对艺术的讨论生发于严苛而让人无奈的社会环境，所以这种讨论的首要功能就是对抗和批判。以此为基调，艺术实践活动和其他实践活动比如经济调控、政治改革、民主革命等的终极要旨一样，都是为了创建一个人人得以实现自由和价值的人道主义国家。这个地方没有强权统治，没有落后的社会现实，但是拥有一直对抗各种形式异化的自觉个体和勇敢保护这种个体的群体。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语境里，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能够彰显人格光辉和人道主义光芒的动态结构，它能够改变现状。艺术实践是专属于人类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与科学不同，它不是累积的，它的爆破不依存于现有的公式和固定的规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形式进行批判的标准。它能够改变社会现状。但很显然，艺术并不能够直接改变社会现实，它只能作为一种中介，通过搭建一座沟通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将个体导引到一个需要他们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过上自由生活的理想之地。

也就是说，艺术活动的功效发挥需要借助于乌托邦属性的呈现。南斯拉夫著名作家多布尼卡·科西奇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具有更高意义的存在，是对死亡的拒斥。”^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也说过，“乌托邦成分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的完全消失，则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会呈现出全新的特性。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变成了不过是物……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创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⑤斯大林极权主义试图通过对文化领域的管制来歼灭的正是艺术活动中的乌托邦属性。这种乌托邦属性的失效不仅会拦截能给人的灵魂带来启发和遐想艺术作品的创作，也会从源头上阉割南斯拉夫艺术家和哲学家通过乌托邦旨意的表达而构建未来的权利，从而形成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坎格尔加所说的人的异化。坎格尔加认为人的异化都是从未开始的，因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是指人应该和能够成为的事物。所以蕴藏在被斯大林极权主义管制的南斯拉夫文艺活动中的乌托邦属性不能仅仅作为一份科学杜撰或虚幻奇想逗留在思考中，还应该成为一份具

① 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31—32页。

②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22—23页。

④ 多布尼卡·科西奇：《文化与革命》，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209页。

⑤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8页。

备矢量的力的激励、一份通过实践可以通达美好新世界的详尽指南。它将通过人的力量的觉醒爆破严酷现实，并指引人类奔赴人道主义社会。^①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利用文艺作品的乌托邦属性去实现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功能呢？哥鲁波维奇对此进行了阐述。

（三）扎戈卡·哥鲁波维奇对文化乌托邦功用的阐释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在其《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一文中深入探讨了文化乌托邦的功用问题。

首先，哥鲁波维奇批驳了彼时南斯拉夫国内正统马克思主义将文化当成习得习惯和传统遗产的看法。她认为，这种把文化当成社会遗产的观点严重窄化了文化的功能，尤其悬置了文化的人道主义实践功能，从而阻隔了人类更新自我通向全面发展的路途。“文化总是处于概念与现实、理想与实在、新生事物与既有事物之间。但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文化通常并没有被定义为一种其结果要由人的人道化来衡量的人道化过程，相反却被更狭窄、更实用地当成了一定社会制度中人的一种社会遗产。”^②

她指出，真正的文化应该是一种人道主义实践。“文化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结果，即通过人对一种更人道的生活的设计而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来实现人的人道化。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人能更好地决定其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发展其新的生活方式，以满足其基本的需要，丰富其动机，并发展为一个更全面的人。这个定义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构想了文化，并把文化视为一个整合了各种不同因素及其特殊功能的唯一整体，包括各种亚文化，及其在人和世界的人道化过程中执行一定的基本任务时所起的不同作用。”^③由此可见，哥鲁波维奇认为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完成概念，它具有创造性、动态性、目的性、世俗性、社会性、批判性和多样性，置于南斯拉夫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艺术实践并不总是发生于书斋，并不总是言说观望。既然文化是“一个整合了各种不同因素及其特殊功能的唯一整体”，那么被整合进这个整体的各项因素对艺术人道主义功能的发挥都有影响，涉及一个艺术作品的作者、文本、读者或者说欣赏者在艺术发挥人道主义功能的过程中应该各司其职。其一，艺术的繁荣是艺术发挥人道主义功能的基础，它不该被部分特权阶级操纵而成为沟通工具或者被粗暴论断，它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其二，艺术并不是经济政治的机械反映，它不该被当成适配特定社会体制的固定模型，艺术领域具备自主性和自在性，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应该回到人的丰富性中，用感官去感知去抒发，为读者提供一种对世界的创造性的反映。其三，读者也应该具有对多种艺术样态的包容能力和感受能力。最后，在这种自由自在艺术领域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最后会集聚成一股巨大的人道主义力量——这股力量的彰显不仅仅体现为塑造具备力量的文本人物，还表征为作家和读者在人与社会、自然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互动和对决中凸显出属于人类的特有力量。

其次，哥鲁波维奇批判了将文化解读为上层建筑的观点。她认为将文化定位为上层建筑这个提法，将文化与实践的人类活动割裂开了，导致了文化重要性的不可还原性。根据这种观点，“上层建筑与实际生活是隔离的，对基础仅仅有着一种次要的、反射的影响。……换言之，物质世界对人的生活才是重要的和根本的，而另一个世界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会高于根本的物质关系，并偶尔在人类历史中发挥一定的作用。”^④因此，无论是把文化当成传统遗产还是当成上层建筑，其实都是犯了将人的实践自主性从文化创造中抽离出来的错误。因为文化创作的主体是人。而艺术作品只是为人类搭建了一座桥梁，一座沟通现实世界和乌托邦世界的桥梁。“因此，文化在两个方向上——即从（一定的）现实向（可能的）乌托邦以及从（可能的）乌托邦向（一定的）现实——构成了一座可供通过的桥梁。由于文化的存在，现实永远只能是可能事物的一种部分而绝非一种完成的存在。”^⑤因此，文化作为一种可以对抗异

① 参见米兰·坎格尔加：《马克思哲学的意义》，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44—58页。

②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57页。

③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62页。

④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63页。

⑤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64页。

化改变世界的人道主义实践活动的功能属性，并不主要体现在它作为社会遗产的那一部分，恰恰相反，体现在它置身于社会遗产属性之外接壤乌托邦世界未经完结的那部分。

再次，哥鲁波维奇认为，面对当时南斯拉夫斯大林极权主义管制下的艺术创作环境，对艺术行为乌托邦属性的强调和乌托邦蓝图的具体规划，才是充分利用好艺术沟通社会现实与乌托邦世界纽带功能，创建人道主义新世界的重中之重。所以她对艺术乌托邦属性的强调，并不是希冀借助对乌托邦的幻想逃避现实，而是希望借助乌托邦接壤未来的属性来为此在纠偏。她说：“大多数文化定义都忽视了与永恒的人道化过程相关的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因此，最为经常地受到排斥的正是文化的乌托邦方面，即对理想的追求……而文化的本质特征即‘自由王国’却被忘却了，而且在原则上，只有通过超越既定的、已经构造和确定了制度，文化才能实现其人道化功能。”^①那哪些人可以肩负这种彰显艺术作品乌托邦属性的使命呢？哥鲁波维奇认为只有那些把文化体验为一种生命本质的人才能够用文化去建构生活。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特殊的人才能从事文化，或者文化是不是只属于某种高贵阶层？哥鲁波维奇认为答案并非如此。

哥鲁波维奇认为，“人的人道化最重要的在于预设了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发展，通过这种发展，人不仅创造了各种精神成果，而且也创造了极其重大的物质进步。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预先拥有各种一般的能力，因此，它在每个人的能力当中便成为一种文化存在。然而，在历史上，文化已经发展和进化为各种特殊的活动，这些活动脱离了其他一些要求物质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基本活动：它已经通过从事‘较高级’和‘较低级’的劳动类型的人的分化，发展成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活动在建构一种‘高级的’、为特权阶层所享有的文化的过程中留下了其印记。就大多数个人而言，文化的贵族(élite)特征并不是天生无能提高文化存在水准的结果，而是贵族对待‘群众’的态度的结果。”^②所以对文化的分类其实是阶层化差异的结果。并且在南斯拉夫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斯大林当局不允许文化执行其作为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调节者的功能，并宣布乌托邦是不合时宜的幻想，“严肃的音乐仍被限制在座位有限的音乐厅里，而‘乡村’音乐之含混不清的模仿唱片却大量地生产”^③，很多人能接触到的，可以辨认出的艺术形式只有连载小说、文摘报、电视连续剧等大众文化。换句话说，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大多数人，其实既接触不到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尊奉主义文化工作者为特权阶层专门设置的符号表达系统，也接触不到能够给大众传递乌托邦美好旨意的艺术作品。文化工作者也成了统治阶层操控的对象。换言之，政治支配了属于文化的一切因素。于是我们发现，尽管一些文化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公众对于文化的真正需求，但是他们在严苛的创作环境下选择了放弃公众。

所以，哥鲁波维奇认为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容器，它和高雅文化的区分，还有文化工作者和群众的对立，都是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统治阶级和尊奉主义艺术工作者特意为之的结果。因此以电视连续剧、连载小说为标识的大众文化可能确实是粗俗的，因为它不具备哥鲁波维奇所强调的文化的乌托邦属性，但它在民众中的巨大普及未必是大众主动选择的结果。哥鲁波维奇主张文艺创作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回到民众中去。

最后，在哥鲁波维奇对文艺创作乌托邦属性的描述和希冀中，相较于艺术创作者和作品，作为艺术接受者的读者是重要性相对较低的一环。她认为，在当时的文化政策里，因为统治阶级的特意管控，文艺创作中的主要矛盾其实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文化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之间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解决需要多种向度的努力：首先，在社会环境层面，统治阶级需要把自由还给文化工作者，并且对这种自由的呼求并不是只针对文化工作者，因为“每个个体实现其自身生活状况的自由应该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④统治阶级需要从社会体制的根本上去破除按照阶级和阶层整合人群的方式，重建一种个

①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60页。

②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66页。

③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73页。

④ 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文化：乌托邦与现实之桥》，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第172页。

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和机会基于自身的多元化需求，根据自己的方式，将文化变成一种日常的、根本的需要，从而利用艺术作品的人道主义潜能去改善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其次，在创作者层面，作为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创作者要超越自身的异化，从尊奉主义文化工作者变成鲜活的个体，敢于创造出不合时宜的具备乌托邦属性的文艺作品。这些和跳跃、流动、充满变化鲜活生活接壤的文艺作品将回到它应该属于的生活里去。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读者才有机会接触真正的艺术作品，发现文艺作品具备的乌托邦属性，并在乌托邦属性的感召中，勇敢地刺破那张由社会极权和技术理性铺设的布满了“定在线”的网，成为人道主义新世界中的一员。

三、具体乌托邦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启示

恩斯特·布洛赫提出的具体乌托邦概念，作为一种与不公正此在相抗争的方法，并非仅仅通过美好未来愿景的展望帮人滤除掉此刻的不快和痛苦。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通过理性分析、感性激励的方式为人类精准描述了在抵达乌托邦的路途中，人们必然会遇到的消泯的点、定在线、等待捕获的网，以及人类通过独立思考、勇敢自决、长远规划、谨慎实践能够拥有的破除“等待捕获的网”的机会，以及随后将收获的自由。这是一份兼具理性与感性、悲悯与勇气的清晰路径的实践指南。它适用于人类历程中一切人道主义实践行为，它主张托举庞大社会中个体的价值，也重视探寻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构建能力中呈现的力量。哥鲁波维奇为我们演绎了在具体乌托邦精神旨意导引下对文艺创作路径的积极思考，而她这份被嵌入20世纪南斯拉夫特殊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被置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视域中的文艺创作路径探讨，必然会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例证更能给中国带来启发。这份启发虽然来自20世纪，却依然在叩问着21世纪人类的心灵。

21世纪是一个迅疾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力量的喷薄熔断了已存续千百年的人类的情感和道德纽带，也倾覆了人类建基于自主独立思考之上的、对美好具体乌托邦描绘和实践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如曼海姆所言，也意味着构建和理解历史能力的丧失。因此，诞生于21世纪的文艺作品须将冲破更为隐蔽而细腻的阻力，发挥出重要而深远的作用，才有可能在技术理性的管制和物的盲目裁断中大力托举出勇敢想象、理智实践、积极参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个体。那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具备修复人类在技术力量和物质光环的遮蔽下被逐渐消泯的感知乌托邦希望力量，并通过实践抵达乌托邦的能力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它需要每一个置身于真实生命情境中，对幸福和自由有热烈期许的社会和个体都接受它的设问，并依据自身的深刻思考认真作答。正如布洛赫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都必然产生其本真艺术，都必然产生其本真的反抗。唯有这种艺术和反抗才能使人类的进步成为可能，而这种进步必将会到来，一个人必须相信《希望的原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②

以中国当代的文艺创作为例：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种类繁多的娱乐方式、更新迭代的媒体体验、动态变化的个体精神需求、日常生活场域下的思维转变等变革中，文艺创作该如何发挥出它沟通现实和美好未来的桥梁的作用？它该如何依存着它能与生活中“未完成”部分接壤的属性，释放出强大而美好的乌托邦旨意？它该如何通过对新时代的书写来保存这份美好的乌托邦旨意，并将它具体而真诚地传递出去？它该如何通过这种传达去层级地释放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鲜活个体的热情和创造力？它又该如何引导这些新时代鲜活、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积极进入建设更高层次美好社会的人道主义实践序列中？这些问题都值得身处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文艺欣赏者去思考。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去展开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并付诸实践，也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议题。

对这些议题的回答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寻获启发。

^① 转引自宋涛主编：《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会议实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② E. 布洛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与J.-M. 帕尔米尔的谈话》，梦海译，《世界科学》2007年第4期，第21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①它的面貌呈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不断提升艺术家自身的艺术素养和道德修养,立足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艺术家的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为保障,努力创作出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艺创作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从未缺席的实践样式,不仅表征着文明的进步,也包含着文明退化的风险,并且这份进步和风险都与整个民族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②既然它和人类的命运共存亡,它的核心就应该是人,由技术增列的所有选项都是辅助,它既不能凭借它的“理性未完成”置换具体乌托邦的“希望未完成”,也不能凭借它多元而便捷的传输样态将日常生活自动导入美好乌托邦的序列,它只能加快和扩大由人类认真思考和细致描述后得出的美好乌托邦旨意的传播速度和传递广度。因此无论技术的发展能为媒介的传播注入多么迅疾的速度,也不论媒介将以多么新奇的姿态介入人类的娱乐体验,脱胎于璀璨瑰丽中国梦的人民需求才是锚定一切艺术创作实践的核心要义。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厘清新时代人民的真实需求之后,以厚重的中国文化为底色,以涌动的中国力量为原型,以中华梦为具体乌托邦的蓝本校正,以勇敢坚韧的中国精神为实践动力,高效借力新时代形式多元的技术样态,创造出生动、有趣、鲜活、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以社会主义新文艺为重要标准,加强对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新型文艺载体的正面引导。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新生的世纪。对社会发展如是,对文艺创作亦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③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面对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不断变换、新型文艺样式层出不穷、传统创作样态随时更新的时代召唤,看似挑战重重,其实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马克思主义的希望精神从来都是主张在危机中斩获,在危机中通过主动实践趋于实现。动态变化的文艺创作环境源于动态变化的时代环境和人民需求,它必然发生,而越是在动态变化的创作环境中,作为坚实锚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愈发以一种清晰而有力度的具体乌托邦面貌呈现在每一位新时代文艺创作者面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削减了乌托邦的空想成分,用实践校正了梦想奔赴的方向。它像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地图,坐落在地图之上的每一个坐标点都灌注着泱泱中华一路积淀的纷繁瑰丽的传统文化,也充溢着在新时代前进步履下采撷的缤纷跃动的新鲜创意,它等待着被中国力量夯实,也等待着被中国精神激活。而在这场夯实和激活的实践之旅中,人的力量是始终应该被关注、被书写、被确证、被传递的重要对象。

只有当人的力量被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路径的语境中去书写,这种文艺创作才具备沟通日常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作用;也只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无数个个体梦想的集合被书写的时候,这种文艺创作才具备保全、传递、层级释放中国梦美好乌托邦旨意,并引导每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的鲜活个体积极进入建设更高层级美好社会的人道主义实践序列中的伟大作用。就像布洛赫所言,“乌托邦并非逃入非现实之中;乌托邦探索现实事物的客观可能性,并为其实现而斗争。《希望的原理》乃是全部人类活动的体现;乌托邦导向一种更美好的未来,导向一个人道的世界。”^④

(责任编辑:潘纯琳)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https://www.ccps.gov.cn/tpxw/202410/t20241015_164836.shtml, 2025年4月2日。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https://www.ccps.gov.cn/tpxw/202410/t20241015_164836.shtml, 2025年4月2日。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https://www.ccps.gov.cn/tpxw/202410/t20241015_164836.shtml, 2025年4月2日。

④ E. 布洛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与J.-M. 帕尔米尔的谈话》,梦海译,《世界科学》2007年第4期,第21页。